

社会理论空间转向

孙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研究视阈中，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形成专门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空间研究关注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

1970年代以前被称为“空间失语”时期。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所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且以空间的缺席尤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空间和物理学、数学、建筑学、地理学之间的传统联系遮蔽了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空间并非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而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期间的、自然的、既定的处所，社会行动的特征及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适应或利用。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社会学理论对空间的认知比较欠缺，后现代地理学家索加将这种空间之维的缺失称为“空间性的失语”。在空间失语时期，虽然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齐美尔和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等不乏将空间与社会相联系的有洞见的探索与尝试，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在社会学视野下建构起关于空间的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经典社会理论之中的空间论述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表述或抽象或含糊。

1974年，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问世，社会学关于空间研究边缘而零散的状态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真正把空间要素嵌入社会研究的划时代人物，列斐伏尔提出了严密完整的空间理论体系，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得以清晰呈现。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推动边缘化的空间研究进入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更在于其发出了社会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先声，一个更加接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发展新时期随之到来。

所谓“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是指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在此基础上，地理学想象力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何雪松归纳了以空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指出其“空间转向”主要遵循两条路径展开：路径一，即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路径二，即以福柯、哈维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

综上，空间从游离于社会学视野之外到成为专门的研究主题和新兴的学术取向，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背景。

空间与社会行动具不可分性

传统社会学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尽管社会被界定为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里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由于对空间进行规范性的描述总会涉及几何学、拓扑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色彩浓厚的专门化语言体系，空间因而被蒙上了绝对的、不变的外衣，伴随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被抽象为容器与内容物的关系，空间与社会实际上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动摇，随着西方学界对城市问题研究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纯粹的空间过程，空间模式是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而空间的变迁是生产变迁的结果。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指出的，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动态塑造的。社会是由时间、空间和社会行动三个基本向度组成的复合体。社会行动在时空结构中展开，而行动的后果及其特征映射于空间形态的重构之中，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一

种相互关系，行动可以改变空间结构，但行动必须与空间结构特征相结合，从而形成行动的“空间性”。空间与社会行动这两个基本向度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具有社会意蕴的空间必然成为社会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

空间与时空体验具关联性

传统社会学理论大师秉承历史决定论传统，更多关注时间体验，使得这一时期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存在着对历史情境的过分强调而掩盖或扼杀社会学空间想象力的倾向，即时间(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空间。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学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关于空间的知识难以形成。这一特征在 20 世纪发生了巨大转变，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宣称，20 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革命下知识爆炸性增长，人类获取的新知识比以往几个世纪积累的知识还多，我们身处的时代日益呈现出“同时性”的特征。空间的重要性在新的时间架构下凸现，关于空间体验的考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维度。而对空间体验的关注，要求社会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重新反思空间概念。